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

杨洁勉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

杨洁勉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杨洁勉等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1.7

ISBN 978-7-5473-0369-6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中国②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

IV. ①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4446号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毫米 1/16

字 数: 320千

印 张: 21.5

插 页: 2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369-6

定 价: 36.00元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10年7月1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公共媒体刊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学术活动项目征集公告》，征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围绕建党九十周年而开展的学术项目。其中，征集到的研究著作经相关专家严格评审，共有二十六种优秀著作入选，内容涵盖党史、党建、政治学、哲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部分反映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该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书系的出版得到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资助，在此谨表谢意。同时，我们也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东方出版中心

2011年5月

目 录

引言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及成就	1
一、九十年内外环境和中国外交的历程	1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6
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领导的特点	10
四、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战略和外交布局	15

理 论 篇

第一章 时代观与中国外交	21
第一节 战争与革命观下的中国外交	21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时代观的探索	22
二、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时代观认识的发展	25
三、主要特点和趋向	30
第二节 和平与发展观下的中国外交	34
一、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提出	34
二、和平与发展观的基本思想	37
三、意义与成就	41
第三节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新内涵	45
一、国际体系进入转型期的特点	45
二、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	49
三、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时代观认识上的新 飞跃	53

第二章 国际体系观与中国外交	58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国际体系观与对外关系	58
一、国际体系概念、演变进程和中国的半边缘化	60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和对外关系	65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国际体系观及外交实践	75
一、“一边倒”战略和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	76
二、“世界革命中心”和国际体系的革命者	79
三、中国战略再思考与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改善	81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国际体系观和外交实践	83
一、国际体系观的历史性转变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	84
二、和谐世界理念和国际体系的建设者	88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外交	93
第一节 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国家利益观(1921—1936)	94
一、建党初期的困扰	95
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后的逐渐转变	97
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走向成熟	98
第二节 独立自主国家利益观的形成(1936—1949)	99
一、抗日救国与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斗争(1936—1945)	100
二、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斗争(1945—1949)	105
第三节 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家利益观(1949—1979)	109
一、“一边倒”战略时期	110
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时期	115
三、“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时期	118
第四节 改革开放环境中的国家利益观(1979—2011)	121
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外交	121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利益观的发展	127
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国家利益观方面的	

新进展及中国外交	131
第四章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外交	136
第一节 挑战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	137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137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140
三、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141
第二节 实践中完善的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中国外交	142
一、科学发展观源自实践	143
二、科学发展观重在实践和落实	144
三、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中国外交	145
第三节 理论建设中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外交创新	151

实 践 篇

第五章 中国外交的传统布局	169
第一节 战略伙伴和大国外交	170
一、和平解放外交与保持相对独立	170
二、“一边倒”战略和与苏结盟	174
三、迈向独立自主与不结盟	177
四、积极大国与伙伴关系	180
第二节 睦邻友好和周边外交	183
一、坚持睦邻外交与和平共处	183
二、追求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	187
三、与邻为善,构建和谐周边	190
第三节 继往开来和发展中国家外交	194
一、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194
二、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关系	198
三、机制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关系	201
第四节 开拓创新和多边外交	205

一、被动参与时期	206
二、主动参与时期	210
三、主动建构时期	214
第六章 中国外交的非传统领域	218
第一节 非传统领域外交的发展基础	219
一、中国对非传统领域外交的认知发展	220
二、从传统到非传统领域的外交思想的变化	222
三、非传统领域外交的外部推动和重要意义	225
第二节 能源外交	228
一、中国面临能源的内外压力	229
二、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	230
三、能源外交的主要领域	232
四、能源外交的主要贡献	236
第三节 环境外交	236
一、中国环境外交的发展演变	237
二、中国环境外交的原则	240
第四节 反恐外交	245
一、反恐外交的基本立场	246
二、反恐外交的实践	248
第五节 防疫救灾外交	251
一、防疫救灾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251
二、防疫救灾的外交实践	253
第六节 公共外交	257
一、公共外交的内涵	258
二、中国公共外交的演进	259
三、公共外交的主要路径	262
四、公共外交和中国的国家形象	265

第七章 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	269
第一节 政党外交的内涵和发展	269
一、政党外交的内涵	271
二、政党外交的发展	276
第二节 政党外交的原则和对象	282
一、政党外交的原则	282
二、政党交往的对象	290
第三节 政党外交的作用和影响	293
一、政党外交的作用	294
二、政党外交的影响	298
结语 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外交前瞻	303
一、新时期的机遇和挑战	303
二、理论创新和机制创新	308
三、和平发展的坚强领导	314
主要参考文献	318
后记	329

引言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及成就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过去的九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和壮大的九十年,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自身出路和发展的九十年,也是中国外交不断走向世界的九十年。过去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自身完整且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时代观、体系观、国家观、主权观、利益观及发展观体系,领导中国外交经历了和平解放、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三个阶段,实现了领导者与实践者、世界潮流与现实需求以及国际与国内等的多重平衡,并形成了合理的党的全球战略和外交布局,推动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九十年内外环境和中国外交的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九十年中,中国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于1949年实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又于1979年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迎来了中国的伟大复兴。

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有关民族自决的国际原则已经确立;而在新中国成立前,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便已形成;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美苏敌对逐渐缓和,当代全球化进程启动;冷战的结束更是开启了当前国际体系重组与国际规范重建的历史进程。

正是在国内国际环境既相互重叠又相互错位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把握历史潮流,引领中国外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可以认为,我党在成立九十年来对中国对外关系的领导和实践,本身就是中国与整个

国际体系的关系变动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最重要的方面便是如何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和”与“合”，由此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和平外交”，即“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共同发展，为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营造“对我有利”的周边环境 and 国际环境^①。当然，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的环境不同，因此这一“和平外交”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争取和平解放的外交、争取和平共处的外交与争取和平发展的外交。

（一）争取和平解放的外交（1921—1949）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原则得以确立并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的必然产物。尽管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且总体国际体系环境不利，但正是出于对民族自决理想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第一阶段始终致力于为实现中国和平解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取最大的国际支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致力于追求实现民族自决。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言，中国共产党“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思”，因其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②为了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自决的最大支持，考虑到国内国际反对派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外交选择事实上是一边倒的——尽管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并不相同，但气质上有相似之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甚至写道：“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③

随着党的成长和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党对中国外交使命的认识更为深刻，认识到实现民族解放必须得到更为广泛的国际承认和支持，而非单纯的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这一认识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际社会对国家合法性的认识是相一致的，特别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所确

① 齐鹏飞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1949—200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参见人民网。

③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 年），参见人民网。

立的国家合法性原则相一致的^①。这样，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机遇，向世界广泛宣传党的对外交往理念。一方面，更多地通过类似今天的公共外交手段实现过外交往，如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及其他中国问题学者对延安的访问。另一方面，1940年12月，毛泽东指示应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党的外交政策，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二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的区别，三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四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②。基于这一区别性政策，党最终赢得了苏联等对中国解放斗争的支持，也曾短暂地赢得美国的理解，后者于1944年先后派遣两个观察团到延安访问。

尽管由于美国选择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内战行为，使得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国内和平解放的目标没有得到实现，但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和平解放而展开的对外交往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非殖民化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上，由于中国解放斗争更早结束，因此中国追求更为和平地实现民族自决的理念与经验都为广大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参照，甚至在多年后仍为人称道。

（二）争取和平共处的外交（1949—1979）

独立之初的新中国，发现自身处于一种尴尬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国际上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已经完全形成，中国难有回旋余地；国内由于长期战争而百废待举，建设任务繁重。如果说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外交战略都局限于冷战格局和冷战思维，中国共产党却前瞻性地把握了整个国际社会追求和平与发展、摆脱冷战束缚的共同愿望和必然走势，迅速提出超越冷战思维的“和平共处”外交哲学——尽管后来仍走了一些弯路，即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身陷严重对立的两极格局之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实现完全的民族自决，必须彻底否定国民党原来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鉴于此，毛泽东于1949年初做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重要指示。这两

① 有关这一点，参见张春：《秩序抑或正义？——自决原则对主权合法性》，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关系研究》第三辑），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52页。

点指示的核心精神是强调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它不仅坚决贯彻了民族自决的精神,也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两大阵营严重对立限制了各国的外交战略选择,但超越两极格局、实现各国和平共处,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于1954年4月与印度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月后又与印度、缅甸一道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亚洲国家和世界所有国家的关系之中。半个多世纪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1955年万隆会议和后来建立的不结盟运动等都以此为基础。

在冷战两大阵营高度敌对、民主主义革命热情尚未消逝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和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必然遭受很大限制,这导致了中国外交的一些权宜性让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新中国成立之初所确立的“一边倒”外交战略和20世纪6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路线。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外交的和平共处原则,并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逐渐率先实现了外交路线的纠正^①,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关系、1979年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以认为,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仍为冷战结构所束缚时,中国便已成功摆脱两极桎梏,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外交原则,引领了时代潮流。

(三) 争取和平发展的外交(1979—2011)

20世纪70年代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转圜,使中国远早于其他国家实现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目标——如果以冷战结束后世界为全球化力量所整合为参照的话,其必然逻辑后果是,在很多国家仍依附于两大阵营、搞意识形态斗争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超越了冷战终结后的和平共处,再一次前瞻性地将视野转向了更高阶段的“和平发展”,紧紧抓住刚出现不久的当代全球化浪潮,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

^① 有关“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的冲击及修复的讨论,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79—882页。

的和平外交道路,为今天的中国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就在世界因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采取一系列对抗性行动而导致冷战再次升级之际,邓小平前瞻性地指出,当今世界的两个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由此而来,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除一如既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外,还要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简单地说,中国外交的使命从先前的“经济为外交服务”转变为“外交为经济服务”^①。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言,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外交方面的集中表现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②。

在紧紧把握全球化这一时代潮流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再一次领先于世界。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讲话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回应,国外媒体也对讲话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认为这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并希望与其他各国共建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信息。与此同时,中国逐渐发展出实现和谐世界的具体道路和方法,那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通过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正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并以自身的发展不断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因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③。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争取和平解放、争取和平共处还是争取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中国“和平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

① 庄小军、吴光祥:《感悟当代中国外交——中共领导集体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智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新华网,2005年12月22日。

产党根据不同国内国际环境而确立的具体外交路线和政策。正因为将“和平外交”的总体方针具体化为不同时期的具体路线和政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同时又不脱离实际,才使得中国今天的外交发展为一种“立体思维,立体操作”,才“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①。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九十年,是中国从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九十年。在这九十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即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这一独具特色的外交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正因为此,它既有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共同的价值观、国家观、主权观和发展观基础,也有着与之相区别的对外交有着极强指导意义的时代观、国际体系观和国家利益观等理论基础,还有着独特的实践性特征。与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相一致,党在过去的九十年里对中国外交的领导,始终牢牢把握住当今时代的三大历史潮流,即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②。由此而来,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都围绕如何将这三大历史潮流的准确把握落实到具体的外交实践中,进而形成了可统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各方面的三个基本要素,即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和平与和谐外交、把握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开放与包容外交、致力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独立与民主外交。

(一) 和平与和谐外交

如前所述,和平外交、和谐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特征之一。一方面,尽管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但中国始终追求与外国的和平共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本身的力量变化,和平与和谐外交在不同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相同。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中国外交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①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杨洁篪外长记者会侧记》,新华网,2011年3月8日。

② 章百家:《百年回顾——变动的世界与变动的中国》,《世界知识》2000年第4期,第10页。

在和平解放时期,一方面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体系性不稳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全面战争,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区别对待各种力量,为和平解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局部环境的改善并不能改变总体环境的恶劣,因此围绕和平解放展开的外交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更多地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解放努力,发动更大的内战和对抗;也使得党的和平解放外交努力失败。例如,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针对美国、英国等试图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和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①但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显然地只是想就保留美国在华特权而试探中国^②,而英国“紫石英”号等军舰甚至在长江解放军防线试图干涉中国解放战争。

如果说围绕和平解放展开的外交努力总体上失败的话,那么对和平共处的外交追求至少是部分成功的,这集中体现在前文所讨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和扩散上,以及中国领先于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在美苏阵营中的真正相对独立。当然,由于总体的两极格局限制,“一边倒”、“两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等政策也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性和短期性的战术选择,并未成为中国外交的长期性战略。事实上,即使在执行这些短期性政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仍在思考如何真正实现和平共处的外交精神,其最明显的体现便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对于和平共处精神的运用体现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一员,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第一世界中威胁较小的一方^③。

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中国外交对于和平与发展的追求,或者说中国的和平与和谐外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加快,特别是21世纪头十年后半期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和平、发展与合作这三大时代潮流得到了全球性关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等外交战略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尽管仍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② 庄小军、吴光祥:《感悟当代中国外交——中共领导集体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智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7页。

存在一定担忧,但国际社会总体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更可能实现“和平”的权势转移,因为新兴大国更多是采取融入现有国际体系,进而对其中的不合时宜的规范、规则加以修改的改良性策略,而非直接推翻现有国际体系的革命性战略^①。

(二) 开放与包容外交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外部世界持开放态度。具体到外交事务上,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不仅对各种力量持开放和包容态度,而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和历史潮流持开放和包容态度。

一方面,尽管存在对不同阶级的划分,但我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对各种国际行为主体都持开放和包容态度。如前所述,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便开启了今天正迅速发展的公共外交、政党外交等手段,如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访问等。又如,尽管新中国刚成立便面临着两极格局的严峻形势,但党仍坚持“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一致的,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③今天,尽管仍坚持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中国共产党也相当重视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传媒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影响,全面拓展民间外交、

① 张春:《权势和平转移与中国对美战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Andrew Cooper, Richard Higgott and Kim Nossal,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Vancouver, 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3), pp. 20-21.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页。